

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曹世昌

共產主義一詞，在西方遠古即有。約在一八三〇年以前，殊未習用；大概在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九年間，法國巴黎發生秘密革命組織開始使用此詞。約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七二年中，當時所稱共產主義，往往專指主張推翻資本主義之社會思想行動。至於自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則因為習慣互用關係，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名詞之間，幾可劃一等號，彼此儘可相互調用，不啻是一而二，二而一。在一九一七年前三四十年之中，共產主義一詞已不甚流行；直到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成功，布爾什維克主義興起後，共產主義此一名稱又復活而盛行，且與社會主義形成之區別，日甚一日（註一）。共產主義的思想本為對私有財產制度的反抗，因之，私有財產制度建立以來，或隱或現的都有共產主義思想出現，不過都是片斷的、零亂的，不能成為體系，直到馬克斯手裏才構成一套完整的體系。因之，對於馬克斯和恩格斯以及列寧和史太林之思想統稱為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自一九一七年為蘇俄共產黨付諸實施，迄今已六十年，但結果並未達到勞工天堂的理想。雖然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共產黨的勢力曾擴展到東歐及遠東地區，在這個半多個世紀之中，有十多個國家被關入鐵幕內，不過這並不是意味着共產主義的成功，而倒因為共產主義的擴張，使其根本弱點更為暴露，使吾人更為相信共產主義的必然崩潰，茲就其崩潰的原因臚陳如次。

一、泯滅人類自然的本性

自古以來，中外學者談「性」的很多，但對「性」及「人性」為何？始終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有的說善惡混，有善亦有惡；有的說，人性像一張白紙，染於赤則赤，染於黑則黑。大概在我國各家學說中，儒家多主張性善，故說：「人人可以為堯舜」；法家主張性惡，故要嚴刑峻法，懲奸罰惡；道家主張性善，故要人「不失赤子之心」。西方學者柏拉圖（Plato）主張性惡，認定個人自私自利的觀念，人類愛國家社會，不如愛自己的家庭與自己的財產。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主張性善，認定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深信社會的成立，不須強制的權力。在宗教上，佛教主張性惡，故要人明心見性；基督教主張性惡，故要勸人悔改，向神認罪。這些學說雖然紛陳，但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確實不容易得到一個究竟，故還是抱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態度較為明智，也不必膠柱鼓瑟爭執下去，不妨從其他角度來觀察，也許可得到一個比較一致

的見解。我們知道人性的特點很多，但有幾點，頗值得吾人注意，可能會獲得一般人的贊同，茲略加申論。

(一)崇尚自由：愛好自由不但是人類的本性，而且是一切動物的本性。所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正是動物的理想境界。江河裏的魚比金魚鉢裏的魚長得更肥美，山林中的鳥比金絲籠裏的鳥更活潑更健碩，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為這是適應物之本性。國父嘗謂：「人爲萬物之靈」（註二）人之「靈」於萬物，亦即「異」於萬物，故其需要自由的程度，當然也更爲迫切和重要。不過人類所需要自由不像一般鳥獸那樣單純，因而其過程也比較複雜。根據盧梭的社會契約說，人類在原始時代是十分自由的，不過大家只顧自己的自由，以致妨礙了他人自由，甚至發生強凌弱，衆暴寡的弱肉強食現象，於是大家就共同訂立契約，同意犧牲一部份自由來組織社會，成立政府，其目的在維護自己的安全與自由。所以根據此種學說，假如政府措施不當，違背了民意，人民即可起而革命。所以盧梭的學說是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基礎。由此可知政府是保障人民自由的工作，而非壓迫人民的工具。但政府往往會落在獨裁者手裏，所以又迫使人民不得不發動流血革命來推翻它。革命是一種破壞的行動，對於國家和人民都是不利的，所以聰明的政治家們發明一種民主政治制度來糾正這流弊的發生，而達到汰舊更新的目的。民主政治是以民意爲依歸，凡不合乎民意的政黨，自然不會得到選民的支持而執政，反之，執政的政黨，也因為失去選民的支持而下臺，所以唯有民主政治才是真正保障人民自由的政治，剝奪人民自由的政黨永遠是不會得到選民的支持的。而且各政黨爲了爭取選民的信任與支持，也不敢發生剝奪人民自由行動，因此而使人民的自由可以得到一個堅固的保障。獨裁政權則不然，譬如共產黨他們以暴力奪取了政權，便以政權爲壓迫人民的工具，而又以共產黨爲唯一合法的政黨，所以人民的自由雖然被剝奪殆盡，也沒有第二個政黨敢出來替人民講話。這種剝奪人民自由的獨裁制度，既然在本身缺乏新陳代謝作用，不能達到自行改正的目的，所以結果人民唯有走向革命之一途。因之獨裁政治之必然發生革命，猶如影之隨形，是不可避免的事。同時共產主義既是壓迫人民自由的獨裁政權，而愛好自由又是人類的本性，所以人性之反共是自發的，永恆的，是不會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換句話說，人性之反共決不會因爲時間的延長而沖淡，也不會因爲空間的擴大而減低。所以愛好自由的本性是獨裁政權的死敵，二者沒有妥協的餘地，其理可謂昭昭明甚。

(二)自私自利：自私自利雖然不是好名詞，但我們站在客觀立場，又不能不承認這種事實。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只能求之於少數聖賢豪傑，而不能責之於一般凡夫俗子，儒家深深瞭解這一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們把自己與他人分開觀察，先由己而後推及於人，這是人情之長，當然也是順乎人之本性，所以儒家學說能爲後人所樂於接受。而墨子則不然，他主張尚同和兼愛，硬要人「視人之身若其身，視人之家若其家。」把自己和他人一律看待，在人情上可謂不通，如果真有人如此作，那也不過是矯揉造作而已。所以孟子批評墨子爲「無父無君」。這就是因爲沒有認清人類自私自利的本性，因而其學說也被後人所輕視。歐洲的正統派經濟學家對於這一點也深有認識，亞丹斯密即持這種看法（註三），他認爲人性是自利的，在

這裏他沒有把自私自利連在一起，但二者大同小異。因為人性是自利的，所以人類都是為自身的利益與幸福而努力，而且總是尋求最有效的方法，以求達到自利的目的。因為唯有自己才能最明瞭自己的利害，自然也用不着他人來越俎代庖。所以這些學者認為政府對於人民的事情，儘可放手不管，聽任人民自己來作，政府的任務只要能夠維持社會治安，保障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了。同時這些學者又認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富了，國家自然也會富強起來，這一點與孔子所說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可謂不謀而合。這種學說實行起來果然十分有效。不久，英國工商業突飛猛進，蔚為世界強國，可說就是這學說之賜。當然，這種學說並不是盡善盡美，毫無流弊，因為這種政策推行的結果，工商業雖得到急遽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也大為提高，但貧富的距離因此也變得更为懸殊了，可謂美中不足之事。因而英美的學者又實行「反托拉斯法」，以防止工商業的壟斷現象；又實行累進稅以平均人民的財富，這些都是糾正的方法，實行起來，非常有效。可是共產黨並沒有這樣做，他們認為這是私有財產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他們就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將一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這種因噎廢食的辦法，俄帝實行不久，就嚐到了苦果；人民普遍怠工，工農業生產銳減；於是哀鴻遍野，災黎載道，就迫使俄帝不得不改行所謂新經濟政策，但此係共產主義制度本身的錯誤，並非改變政策所能奏效。所以俄帝到現在仍然在普遍的鬧饑荒，共匪所竊據的大陸連年饑荒嚴重，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古巴本來是豐衣足食的國家，誰知道卡斯楚偏偏也要東施效顰，也鬧着大饑荒，雖然他曾利用綁票的辦法向美國勒索巨款，但也救不了急，如此說來，難道饑荒永遠跟隨着共產黨嗎？其實這並非上帝之不仁，故意以饑荒來懲罰他們，而是他們沒有認清人之本性。直到如今，共產黨還是執迷不悟，硬說是反革命份子和他們搗亂，任意栽贓，真是傻得可笑。其實，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如果辛勞終日，工作所得竟非我之所有，充其量不過換個空空洞洞的勞動英雄美名，一時喪失了理智，但當妻離子散，饑寒交迫，囊空如洗時，他們自會以柔腸寸斷的悲憤情緒，化為革命的行動力量，這是人性的真正覺醒，不管共產黨用甚麼手段與方法，恐怕也無法阻止這革命洪流的蔓延。

(三)具有理性：總統 蔣公說：「大家要知道，我們中國哲學思想是出發於人類理性，說得明白些，就是嚴辨人類與禽獸之分。因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其有理性，因為有理性，所以他有了生活，還要充實他生活的內容。」（註四）由此可知所謂理性，即天理人性。因為人性具有理性，所以能夠別善惡，明是非。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人之良知良能，只要不被物慾所蔽，人人都有這種辨別的能力。譬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是父、子、兄、弟間應有的行為。只要是一個正常的人，都會作到這一點。一個人作了壞事，自然會感覺到忐忑不安，作了好事會覺得心情坦然，喜形於色。因為自己知道這是應該作的事，所以作到了就感到很愉快。如果應該作而沒有作，那不是因為你不知道應該作，而是由於其他原因使你的理性泯沒了而不願意作。不然，我們為什麼常說：「公道自在人心，正義常存人間」呢？如果人類真的沒有理性，那麼就分別不出善與惡，還談得到大家所公認的「公道」和「正義」嗎？正因為大家都具有同樣的理性，所以才能有同樣的認識，因而才發生大家所公認的「公道」。

與「正義」。換句話，這是由於大家在主觀上先有了共同的認識，而後在客觀上才產生了公認的標準，這就是人類具有理性的證明。其次，正義的義就是宜，宜是應該，所以應該作的事，作了就是義，不應該作的不作也是義。正義是靠人的理性來認識來辨別的，因之正義是以人的理性為其存在的前提，二者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只要是一個正常的人，都應該具有正義感，孟子說：「人之所以異與禽獸者幾希」的話，我認為指的就是這種理性。這是人獸之分野。易言之，具有理性的是人，否則是禽獸，是物不是人。所以失去理性的人，我們稱之謂衣冠禽獸，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所以為人的條件。當然，這些不過是少數喪心病狂的人，至於大多數人，表面看來好像是失去了理性，其實理性仍然存在於他們的內心，不過受到外界的阻力和壓迫，一時不能表現罷了。共產黨知道理性是他們的死敵，所以就千方百計的去剷除它，希望每個人由「人性」變成「獸性」和「物性」，這也許就是唯物辯證法的又一巧妙運用吧！他們以慘酷的手段進行「三反」「五反」，鬭爭清算，故意拆散人的婚姻，毀滅人倫道理，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與禽獸何異？共產黨如此的作法，固然一方面由於自己泯沒了人性，但同時也是共產黨故意玩的花樣，企圖將善良的人性變成獸性；這樣，善良的人才能與他們同流合污，變成他們的真正同志，這是共產黨剷除心腹之患的辦法。不然人獸不能為伍，縱然在一起也是貌合神離，同床異夢，這對共產黨又是何等的危險？要知人必竟是有理性的，理性是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他們一切鄙卑的勾當與手段，不但不能泯沒人的理性，而且會喚醒了人的良知，加深了人民對共產黨的憎恨與憤怒，他們在人性光輝的照耀與正義力量的制裁下，必然加速共產暴政的覆亡。

二、遏阻人會進化的潮流

所謂社會進化潮流者，即社會進化之趨勢，此種趨勢猶如水之就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其進行速度雖有遲速，有時或者受到阻力發生倒退現象，但其前進的方向是不變的。關於現代的社會進化潮流問題，雖見仁見智，未盡一致，但大體說來，認為社會進化潮流應該包括民主政治和民族主義兩方面，似乎大多數都有相同的看法。這種看法也是與國父的意見不謀而合，因為國父將社會進化分為三個階段：即神權時代，君權時代和民權時代。所謂民權者即主權在民的意思，當然也就是現代所謂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到底發生在甚麼時候，不可否認的是發生在希臘時代（註五），不過那時的民主政治與現代的民主政治不同，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伴隨着資本主義社會而發生的。民權時代以前就是君權時代，那時候統治權操在君主和一般貴族手裏，可是到了十八世界工業革命以後，政治制度的本質逐漸發生了新的轉變，原因是工業革命以後，機器代替了人工，生產突飛猛進，商品的種類也隨着增多了，於是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慾望也較前大為增加，尤以君主和一般貴族為最著，而慾望增加則消費增加，消費增加則支出加大，於是入不敷出，財政陷於困境，君主不得已就必然走向增加課稅之一途，而課稅的最好對象就是當時新興的工

商階度，他們有的是錢，可以負擔政府的課稅，但他們繳納租稅時却也向君主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人民的參政權利。同時，當時的貴族因為生活的腐化，而且又無向人民徵稅的權利，於是就變賣財產或告貸於人，以致逐漸沒落而失去了原來的政治地位，代之而起的就是一般新興的工商階級，這就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開端。所以我們說民主政治是伴隨着資本主義社會而發生的，其發展過程，英國議會制度的演變史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其次，民族主義也是現代社會進化的一道主流，其發展也是與資本主義社會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因為工業革命以後，如前所述，一般工商階級逐漸提高了政治地位而爭取到參政的權利，同時由於生產的增加，急待尋求銷路，但歐洲在工業革命以前，有些國家內而諸侯林立，關卡重重，外而海盜橫行，商旅為之裹足，國際貿易進行尤為困難，因之當時的工商階級就願意幫助君主整軍經武，而君主自己為了擴充勢力也樂意接受這份情意，結果使君主削平諸侯統一國內，取消關卡，擴大了市場，同時建立海軍，更開拓了國外貿易市場，德意志、意大利等國家的統一運動就是在這種要求下完成的，於是民族主義的浪潮就瀰漫於全世界。由此可知，民主政治和民族主義是現代社會進化潮流中兩條主流。它們隨着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日趨擴大其影響，壯大其力量；現在天、海之角，可以說無遠而弗屆，它使君主政體一個一個地倒下去，幸存的也是名存而實亡；它也使殖民地一個一個地宣佈而獨立，走向民族自決的大道，以前所說的黑暗大陸，現在也燒起了熊熊的民族主義之火，也高唱起民主政治的口號，所以時至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這兩條社會進化的主流較前更為壯大了，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任何人也無法否認。

不過也許有人說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也會引導帝國主義的發生嗎？而帝國主義是與民族主義相對立的，二者不能並存，又將何以解釋？不錯，過去的現象的確是如此，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導致了生產過剩現象，而為了尋覓商品的銷路，就自然的向外掠奪殖民地，作為本國商品的銷售市場和生產原料供給地，但這些都是過去的陳跡，自從二次大戰後，各工業先進國家的政策發生了急遽的轉變，因為他們發現掠奪殖民地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更引起了嚴重的問題，因為大家爭奪殖民地的結果，就被迫走向戰爭之一途；戰爭的結果是兩敗俱傷，這種血淋淋的教訓，他們怎能會輕易忘去？同時他們更發現殖民地的經濟落後性，也妨礙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貿易的進行不是片面的給付，而是對等的交換行為，殖民地既然一貧如洗，將以何物進行貿易？所以當前的急務是發展落後地區的經濟，使他們的生產除了消費仍有剩餘的時候，自然就可以對外進行貿易了，這種利己利人的思想，引導了各工業先進國家對於落後地區開始實施經濟援助，美國的第四點計劃和進步聯盟都是在這樣的構想下產生的。如此使「無」的國家變成了「有」的國家，而後大家才能和平相處，進行國際貿易，這種政策與舊日的帝國主義佔有思想和愚民政策，在本質上有着天壤之別，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非洲的殖民地相繼的獨立了，他們的獨立都是得到工業先進國家的同意和支持，現在他們都進入了聯合國，平等地和其他大國分庭抗禮，這種局面，在第一次大戰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這是民族主義的一大勝利，由此可見這兩條社會進化的主流——民主政治和民族主義，隨着時間的演進，其力量更趨於壯大而雄厚，確是不爭之事實。

可是共產主義的本質恰巧與這兩條進化的主流相反，因為共產主義國家內，實行的是一黨專政，除了共產黨任何黨派都無參政的權利；除了無產階級，任何階級都是反動份子；像這樣的獨裁政治，可以說是亙古所未有，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制度對之也要退避三舍。所以共產主義與民主政治是勢同水火，二者決不能並存。其次，共產主義的目的在建立全世界的蘇維埃政權，他們的口號是「工人無祖國」；更說明他們也根本否認了民族主義的存在和價值，如前所述，我們既然知道民主政治和民族主義是現代社會進化的潮流，那麼共產主義思想就是違背社會進化的逆流，這一小股逆流，雖然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也曾掀起了一陣漣漪，但仍然阻止不了那洶湧澎湃的社會進化的潮流，在這個浪潮裏，任何逆流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踪，這是我們深信不疑的事。

三、違背人類文化的傳統

文化傳統是人類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累積起來的，正因為此種原因，它對於人類的影響也更為普遍而深刻，所以一種學說違背了牢不可破的文化傳統，結果必然會遭到莫大的阻力，以致為人民所唾棄，社會所不容。

文化是人類對於社會進化所作的各種貢獻的總和。內容極為廣泛，例如學術思想、文學、和宗教等都應包括在內，所以如果想對人類的文化傳統作一詳細的介紹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此只能把握其重點，作一簡括的介紹，同時世界上各國林立，一敘述，亦為事實所不許，故僅就中西兩方面作一鳥瞰式的觀察與報導。

首先說到中國的文化傳統，提到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可諱言的，孔孟的思想是形成我國文化的主流；而孔孟的思想，一般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人均稱之謂人本主義，所謂人本主義者應包含兩種意義：一為重視人與人間的行為，對於宗教，很少論及，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就是說其重點在「人」而不在「神」；另一種意義即重視人民的權利與地位，即含有民主的思想在內，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以及「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些都充分表示出重視人民的思想。孔子說得更明白，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思想到後來雖然沒有發揚光大，但由此也使後來的統治者瞭然於人民的重要性，如「順民者昌，逆民者亡。」又「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都是主張人本主義的結果。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產生像西歐那樣專制的暴君，即如有，也不能維持很久。換句話說，中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要比西歐人民為多，這就是中國以往不重視自由的原因，因為人民沒有感到「自由」的需要，所以自由兩字也就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人不懂得自由的意義和價值，而是一向生活在自由的空氣裏，所以沒感到自由的可貴與需要。其次應該注意的就是中國的人本主義與西歐的人文主義並不完全相同，因為後者又派生出個人主義，而中國的人本主義是建在家族基礎之上的，所以中國的一切倫理道德都是以家族為出發點，孔孟的思想就是這種家族本位文化的代表，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又「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浸淫日久，以致形成了中國的傳統道德，而且使中國變成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因之人本主義的思想和家族本位的倫理道德就成了我國的重要的文化傳統。

其次，再談到西歐的文化傳統。西歐的文化，如果除去中世紀不談，可以說都帶有人文主義（Humanism）的色彩（註六），即在希臘羅馬時代亦不例外；希臘羅馬時代的學術思想所以有輝煌的成就，就是當時人的思想沒有被宗教所束縛，可以自由的思想，可以自由的研究，因為他們的腦海沒有被神的力量所控制，仍然會注意到人類所發生的一些問題，這就是希臘羅馬時代學術思想所以進步的原因。及至中世紀，人民開始沉醉在宗教的狂熱裏，人民的生活起居，以及思想言論，無不以神為最高原則。這時候的文學和藝術，不過是歌頌神的偉大和贊美天國的美麗而已。他們所看到的是將來，而不是現在。可是這種情形到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就大不相同了，這時候人文主義再度抬頭，人類開始從神的迷夢中覺醒過來，人文主義是不崇拜任何權威的，不僅不承認神的權威，而且也不承認人的權威，和任何習俗或傳統的權威，一切訴諸理智，不盲目崇拜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因而從這裏又派生出所謂唯理主義（Rationalism）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註七），因為不崇拜權威，即不承認任何人有超人的權力，大家都是一律平等，個人是最重要，國家和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個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人文主義的發展，必然會促成民主政治的發生。西歐的人文主義派生出個人主義，這一點與中國的人本主義的發展方向不同。也許是因為歐洲中世紀的政治過於專制黑暗的緣固吧！個人主義所崇拜的是自由，自由是在歐洲中世紀最缺乏的東西，因而「自由、平等、博愛。」和「不自由毋寧死」，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基於以上所述，無論為中國的人本主義，或西歐的人文主義，其中都含有民主自由的思想，不過在西歐近兩百年更為顯著，因而也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宗教也是文化傳統的主要部份，宗教自始即和人類結下不解之緣。古代社會無論政治或教育都帶有宗教色彩，所謂「奉天承運」或「神道設教」，都是假借神的權威來施行的。一直到現在宗教色彩雖然沒有以前那樣濃重，但在人類的精神生活中，仍站有極重要的地位，現在誰也不能否認宗教對於社會所發生的穩定作用，所以宗教無形中不但已經成為一些人意識中的重要部份，而且也是社會安定不可或缺的維持力量。這一點無論中外，其情形都是一樣。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大多數為佛教，佛教的中心思想是仁慈，與儒家的仁愛不謀而合，所以能夠得到大多數的信仰，但亦因而使中國人變得更为仁慈、柔弱、及愛好和平。至於歐洲的宗教，不可否認，基督教自從羅馬帝國成立以來，即已根深蒂固的深印在人心，基督的功過問題姑且不論，事實上在中世紀裏，基督教對於文化的保存，確實也盡了不少的力量，一直到現在，歐美人士的起居行動，以及思想言論，無不受到基督教的影響，而基督教的教義，也是以博愛及寬恕為中心的。總之，自從人類步入文明以來，即與宗教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而宗教的教義大都以仁慈、寬恕為其中心思想，所以仁慈與寬恕幾乎已成為人類的通性，同時亦成為人類重要的文化傳統。

基於以上的陳述，知道人類的文化傳統中包含着自由和民主的思想。這兩點都是共產主義所力加排斥的。同時倫理觀念是根

於人類天性成長的意識形態，尤其中國以家族為本位的歷史傳統，倫理的色彩比西方更為濃重，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傳統觀念，牢牢的深印在人心，即使在西歐，倫理的觀念雖然被個人主義的思想沖淡了，但父子、夫妻、兄弟的情感仍然是被人重視的。而現在的共產主義，根本否認這種倫理的觀念，認為這是封建的意識形態，是落伍的溫情主義，如果人與人間真的缺乏了溫情，則人生的意義何在？幸福何在？這些都是違背了人類的傳統觀念，非大家所能接受。其次就宗教而言，不可否認的，共產主義是排斥一切宗教的，因為唯物論根本否認神的存在。但宗教自從人類社會發生以來，幾乎和宗教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其被人們所深信所重視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而現在的共產主義却乾脆的加以駁斥，因而在人們的心理上就留下一種惡劣的印象，試看最篤信宗教的民族，也是最反對共產主義的民族，如篤信回教的阿拉伯人，就是反對共產主義最力的人，由此類推，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他的潛意識裏也都蘊藏着反對共產主義的幼苗，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現在我們可以說大多數人，由於文化傳統的影響或輕或重的都有宗教信仰，儘管他沒有正式受過洗，或燒香拜過佛，但在腦海裏，却相信冥冥中似有神的存在，這是人類當遇到困難或疾病時，心靈上所依靠的一大慰藉，而今這一點也被共產主義所剝奪了，則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深惡痛絕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根據人類數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可以知道人們的心理是徹底反共的，雖然也有一部份人，抱着趁火打劫的心理，也跟着搖旗吶喊，但那是別有用心，而且是極少數，無論如何也挽回不了共產主義失敗的命運。

四、共產主義實踐的失敗

(一) 共產主義政權喪失民心：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權是建立在刀槍的邊緣，以血腥的統治鞏固其存在，已往由於共產主義國家的鐵幕低垂，使吾人對共產黨的眞面目無法瞭解，因而使一般人對於共產主義無形中發生了錯覺。認為對於共產黨的批評，完全是惡意的攻訐，不足置信。這種看法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由於共產國家與外界的接觸，才使吾人逐漸明白鐵幕內的眞實情況。人民生活到底是幸福還是痛苦，由於這一段事實即可得到證明。根據可靠的記載，在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當納粹軍隊進入到蘇俄境內，蘇俄軍隊以為解放的日子到了，因而投降德軍的為數達數十萬人；可惜納粹軍人殘酷成性，不但不能利用，反而予以屠殺，這是共產主義國家人民集體逃亡的第一個例證。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鐵幕國家版圖的擴張，共產黨為了阻止人民的逃亡，凡與自由世界接壤的地方無不架起鐵絲網或築起水泥牆，並且還日夜派人守衛，可是這樣嚴密的防衛，仍然阻止不了人民逃亡的決心。他們冒死穿過鐵絲網，淌過汹涌的河流，逃到自由地區。在西德、在香港，不是天天有這樣的報導嗎？有人將這種鄙棄共產政權的逃亡情形稱為腳選（vote by foot），其作用與手選的作用相同，共產黨既然不允許人民用手與口來表達意思，所以結果只有用腳來逃亡了。這一點足夠證明共產國家的黑暗情形，已經到了人民不能忍受的程度，因而才遭受到人民唾棄，這不是共產主義失敗的具體證明嗎？這是人民嚮往自由的鐵證，不管共產黨用什麼宣傳技術也無法掩蓋這些人民逃亡的事實。

(二)共產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時，蘇俄原有的社會秩序遭到重大的破壞，那就是沙皇的政權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在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中被推翻了，這時蘇俄便進行社會革命，但却遭到反共主義的革命，於是爆發了內戰，直到一九二一年才告結束。由於共產主義的違背人性，所以自開始在經濟上即遭到失敗的命運。蘇俄在革命初期，生產銳減，災荒遍地，所以列寧於一九二一年便提出一個所謂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允許有限度的私有。其最大目的是要保持並增加農莊工廠的生產，而運用資本主義刺激生產的老辦法。新經濟政策實行七年，雖然使蘇俄暫時喘了一口氣，但仍沒有挽回它的厄運，直到現在已六十餘年，人民仍在鬧饑荒，日用品需要配給，買東西需要擺長龍陣，這種物資奇缺的情形，資本主義國家在戰時間或有之，而在鐵幕國家內却成了司空見慣，人民之痛苦，可想而知。饑荒好像與共產國家結下不解之緣。真的，共產黨所到之處無不如此，在東歐鬧饑荒，中國大陸也鬧饑荒，共產主義的老巢——俄帝鬧饑荒，赤化不久的古巴也在鬧饑荒，可見共產國家之發生饑荒決不是偶然現象，而實由於共產主義的違背人性。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論的出發點是「剩餘價值」，但他只從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來鼓吹階級鬥爭，很少講求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經濟法則。但是蘇俄在史達林專政時期，却推行五個五年計劃，計劃的支柱是重工業與集體農場。他將集體農場收穫的農產物分配於工業人口，同時將輕工業分配於農民。由於他對輕工業的投資比重工業少些，輕工業不夠分配，而農民在集體農場上勞動所得者，不過是一點糧食。同時工人在工廠裏勞動所得也只是一點實物。這樣不但影響農民與工人的工作效率，而且產品的質量更不如理想。老實說，這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奴隸制度，無怪馬克斯說：「在奴隸制，奴隸的勞動付了工資的部分好像是不付工資」。（註八）雖然自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後，經濟政策逐漸由奴隸制回到工資制，但勞動者的剩餘價值還是構成利潤，不過這利潤仍是歸於一個共產黨的政權。人性原是自私自利的，而共產主義社會內的人民，因為終日辛勞，不能享有自己的生產成果，所以誰也不願意努力生產，雖然勞動英雄等名詞喊得震天價響，但喊久了，就引不起人民的興趣了。所以結果是工作情緒低落，導致生產普遍下降。根據五十八年十二月份美國新聞處及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分析，知道平均俄國人食物方面支出佔家庭預算50%，而美國僅為17%，而且俄人食物中澱粉質類佔絕大比例，買一磅馬鈴薯在俄國所需要的工作時間為美國四倍，一磅奶油則為美國的八倍，一打雞蛋則為美國的九倍，他如買一件白棉布襯衣，在俄國須要工作十一個半小時，而美國僅為一小時，買一套工作服所需工作時間則為美國的十五倍，買一雙男用鞋則為美國的十一倍。赫魯雪夫在一九六一年曾誇口說，到了一九七〇年俄國的生產量可以趕上美國，可是到了一九六九年，仍然遙遙落後，其實不但在生產方面如此，就是在太空方面，自從一九五七年俄國首先發射人造衛星後，美國才開始急起直追，想不到時至今日，竟然搶先登陸月球，所以美國不但在地面上擊敗了俄國，而且在太空方面也贏得了勝利。當然這不是由於美國人特別聰明才有今日的成就，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是因為自由經濟制度勝過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緣故，換句話說也就是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徹底失敗。直到如今，大陸上的毛共匪幫仍然是執迷不悟，在推行着奴隸制度，致使

(172)

人民生靈塗炭，慘遭流離。我們知道，無論甚麼政權，其目的都在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共產主義當然亦不能例外，可是現在的情形却是恰恰相反，不但不是勞工的天堂，就連人民的起碼生活也難以維持，這無疑是共產主義崩潰的又一證明。

(二)共產主義陣營的分裂：根據共產主義的教條，共產黨是無祖國觀念的。各國的共產黨都應該背棄自己的祖國而為無產階級的祖國——蘇俄而奮鬥。可是現在的事實並非如此，換句話說，共產主義的陣營並非如此堅強。譬如東歐南斯拉夫原是蘇俄的附庸，但狄托於一九四八年竟然背叛了斯達林而獨樹一幟，其原因即是狄托不願意完全聽命於俄國的指揮，企圖保有自己的主權和獨立，狄托主義亦可說是「民族共產主義」，它反映出人民的一種自然願望，均不願受他國的宰制，結果共產主義的陣營開始分裂了。接着是一九五三年六月東德因為糧食的缺乏，工人便開始罷工，並且還提出自由選舉，自由工會等，蘇俄雖嚴厲的屠殺、鎮壓，但仍無法阻止東德人民向西柏林的集體逃亡。三年後，波蘭以「麪包」為口號，撐起了反共的旗幟，由於波蘭事件的影響，又導致了匈牙利革命的爆發，匈牙利革命的波瀾是壯闊的，所以在一九五九年又激起了中國在大陸上西藏人民的反共大革命，：這一連串的革命怒潮，真是一發不可遏止，但具有爆炸性的鬭爭，還是毛匪與赫魯雪夫的鬭爭，使匪偽政權與俄帝造成了敵對形勢，如今雙方的交惡更是日趨嚴重，又有阿爾巴尼亞的搖旗吶喊，大家一起來反對俄帝的領導權；此外如俄帝與捷克的公開衝突，以及羅馬尼亞的離心離德，這些都是共產主義陣營走向崩潰的前奏，又根據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社五十二年十二月出版的今日世界報導說：俄帝想模仿西歐六國共同市場，企圖組織一個包括東歐附庸國家的共同市場，可是結果失敗了。據該刊物分析，因為是民族主義超越了共產主義，所以俄帝最近頻頻發出警告說：民族主義是共產主義陣營團結的最大危機，可見民族主義的種子已經在共產主義陣營內生了根。如果真的如此，其情形確實值得注意。因為民族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剋星，共產主義的目的原在消滅民族意識的存在，以建立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大家如果各愛各自的國家民族，則所謂全世界的蘇維埃豈不落了空？現在俄帝的嘍囉們對於這一點逐漸發生了懷疑，因而共產黨用以欺騙世人的法寶也就失去了效力。所以共產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就在眼前。同時共產主義國家是一種獨裁政權，獨裁政權是不容許發生離心力的，一旦發生了離心離德的現象，統治權就會趨於崩潰，這是與民主政治的不同點，也是獨裁政治的最大弱點。現在這種弱點既然在共產主義陣營內已經暴露，所以我們說整個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就在眼前，這應該是可以預見的事實。

五、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

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係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流弊而構想的一套解決方案。在理論上已顯現出甚多漏洞，自當予以駁斥。不過即如吾人承認共產主義為解決資本主義的有效方案，但其所依據的對象係為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時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日，資本主義本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說面目全非了。因而共產主義所攻擊的各點，自然也成無的放矢

之論。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最好以典型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為例，茲將美國社會的現狀加以敘述（註九），並將其顯著的變化以及所以發生的原因分別陳述如次：

甲、資本主義社會現狀的分析

(一) 財富分散：依照共產主義的教條，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財富逐漸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裏，大多數人成了所謂產業預備軍。這種駭人聽聞的描述，可惜到了現在並未如其所料，而相反的財富倒有逐漸分散之勢。如以股票持有人而論，一九一三年僅為五十萬人左右，一九五二年增為六百五十萬人，一九五六年增為一千萬人，至一九五九年又增至一千二百五十萬人。股票持有急遽的增加，即表示財富分散在多數人手中。如再就股票持有人的職業來分析，則有如下的情形：即家庭主婦佔股票總數百分之三十五，自由職業者佔百分之十三，工商機構的低級職員佔百分之十八，公司高級職員及經理人員僅佔百分之二，其餘百分之三十二則為社會一般人，無論就股票持有人之質與量來分析，財富並未如共產主義所述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裏，可謂昭昭甚明。

(二) 中產階級擴大：馬克斯說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產階級即所謂小資產階級或布爾喬亞階級即將逐漸消滅；其中幸運者上升為資本家，但大多數均淪為無產階級，以致形成了少數資本家與大多數無產階級對立的社會。這種二分法的階級社會，到了現在還未實現，不但並未實現，而且與其相反的情形發生了，這一點又使馬克斯的學說落了空，造物者的有意捉弄馬氏，怎不叫人發噤？茲仍以美國社會為例說明如次：根據瓊斯（Alfred Winslow Jones）於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財產報告 Fortune Survey，上層階級在所有人數調查中佔百分之二·九，上中層、中層及下中層佔百分之四十七，下層佔百分之十四·九，工商業者及自由工作者佔百分之二，其他各種答覆者佔百分之五·七，無答覆者百分之二十七·五，並且說一般人對於階級一名詞觀念模糊不清，這與馬克斯的濃厚階級意識又是大相逕庭，亦值得吾人注意。中產階級的逐漸擴大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良好現象。因為這些人食衣無虞，生活舒適；既無資本家的驕奢淫佚，亦無無發階級的牢騷滿腹，所以中層階級是社會的中堅份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維護者。因而中產階級的擴大更鞏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亦粉碎了共產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自然崩潰的幻想。

(三) 勞工生活改善：以馬克斯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工生活，簡直連豬狗都不如，而且其生活的遭遇，將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日趨惡化，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中葉間或有類似情形發生；而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勞工生活不但已非當年的悲慘情景，而且有逐漸改善的趨勢。關於勞工生活的改善問題，可從工資與工時兩方面來考察：根據一般估計，一九〇〇年美國工業工人每週平均標準工時為五七·三時，比較十年前略低。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仍在五十小時以上，一九三〇年羅斯福新政時期，規定最長工時，凡從事州際的工商業標準工時每週為四十時，一九三八年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正式規定四十時的工作週，並作超時超付的規定。迄今各類工業的工時雖仍參差不齊，但已逐漸逐於一致。如製造業者，自一九

(174)

四七年來，各年平均爲每週四十小時，其間即有多少之別，亦相差甚微。同時期的非製造工業，工時相差略大，約爲三十三至四十不等，平均在四十以下。此爲美國工人工作時間的演變情形。其次，再就工資的增加指數來分析：如以一九一四年工作每時工資所得爲一〇〇，則在一八二〇年貨幣所得指數爲三五，真實所得指數爲四一，至一九二〇年貨幣所得指數爲七五七，真實所得指數爲二五八。如此可知，在此期間，貨幣所得增加二十倍多，真實所得工資亦增加六倍多。以上兩種當然應以真實所得爲標準，較爲可靠。如此可知美國工人一八二〇年以來，工資業已增加六倍多。由以上兩方面合併觀察，一方面是工作時間的減少，一方面爲工資數目的增加。這種現象正與馬克斯所說的榨取勞動力方式恰巧相反。事實如此，吾人怎能熟視無睹，而平空咒罵資本主義社會呢？

（四）經濟恐慌減緩：共產主義認爲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盲目生產，終久會造成經濟恐慌，這是資本主義本質所造成，因而也是資本主義自趨滅亡的致命傷。同時因爲這種致命傷隨着時間的演進，其程度愈演愈烈，所以經歷的時間亦愈來愈久，以致於敲起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喪鐘。不錯，經濟恐慌的確出現過，而且有規律的出現過。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韓森（Alvin H. Hansen）的研究，將美國經濟的發展分爲三種類型：即（一）小循環。每三四年一次，自一八〇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曾有三十七次。（二）大循環。每六年至十二年一次，自一七九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共有十九次。（三）長循環。約五、六十年一次，自一七八七年至一九三〇年曾發生三次。普通將經濟循環分爲四個階段：即蕭條（Depression）、復蘇（Recovery）、繁榮（Prosperity）、和衰退（Recession）。蕭條這個階段一般人稱爲經濟恐慌。可見經濟恐慌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經常發生的，可見馬克斯的說法是言之鑿鑿了。但這是一九三〇年以前的情形，而一九三〇年以後的情形倒有點不同。茲以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形說明如次：戰後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一年共有四次經濟循環。第一次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計長三年十一個月，第二次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九月，計長四年十個月，第三次自一九五四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五月，計長三年八個月，第四次自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計長二年九個月。可見就經濟衰退的時間而言，有日漸縮短之勢。其次就蕭條的程度而言，亦可顯明看出有逐漸減輕的趨勢，如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至一九三三年全國總生產由一〇三八億元降至五五八億元，計降低百分之四十六，個人所得由六八七元降至三六〇元，計降低百分之四十八。但就戰後經濟循環觀察，一九六〇年至六一年，工業生產降低百分之四·八，就業人數降低百分之零點八，而個人所得反而增加百分之一·二。此種些微變動，比較前者簡直不能同日而語，幾乎不能稱爲經濟恐慌，不過爲經濟衰退而已。基於上面陳述，戰後經濟恐慌在時間上不但縮短了，在程度上更是減輕了許多；這種急遽的變化，不但使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士爲之吃驚，而且也使共產主義者大惑不解。這種現象對於共產黨而言，無疑爲當頭棒喝，資本主義社會自然崩潰的如意想法，至此完全破碎無遺，醉心於馬氏教條者可以醒矣。

乙、資本主義社會發生轉變的原因

(一)經濟政策的轉變：經濟政策的轉變由於經濟思想的轉變。而經濟思想自凱恩斯（J. M. Keynes）於一九三六年發表其就業利息及貨幣之一般理論（The General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來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註十）。因凱恩斯以前，正統學派的經濟理論，都是在假定充分就業的狀態下進行的，認為供給的本身即會產生需要，因為有生產即有所得，有所得即產生需要，只有一時的脫節，不會有永久的失調，因而對於經濟恐慌問題，也就不值得重視了，可是凱氏認為生產固然產生所得，而所得等於消費與儲蓄都用之於投資，即可維持原有的就業水準，不會發生經濟失調的現象；但儲蓄並非常等於投資，因為投資需視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而定，而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又視利息高低及儲蓄傾向而定。故儲蓄之是否能夠完全用之於投資，並非如正統學派所說那樣單純，也就是說儲蓄之中必有一部份不能參加投資而離開了生產過程，因而投資加上消費就小於以前的所得，於是生產減低了，就業量也不能維持原來的水準，這就是所謂經濟恐慌。換言之，這一部份儲蓄既然離開了生產過程，不能成為生產者的所得，因而生產者就無法投資，而投資減少，生產即為之降低，此其一。同時投資減少，影響人民之所得減少，而所得減少，則對貨物的有效需要亦隨之減少，此其二。故無論就投資減少，或從有效需要減低觀察，二者均將導致生產萎縮與人民就業水準之下降。所以依照凱氏的說法，經濟恐慌的發生源於投資的減少，而投資所以減少，係由於邊際生產力低，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又視利息高低與儲蓄傾向而定。同時投資減少，導致有效需要降低；而有效需要又與消費傾向有關；故經濟恐慌的防止，可從利息與消費傾向二者着手，即減低利息與增加消費傾向，以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及消費者的有效需要。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高，生產者自然樂於投資，如此即不發生儲蓄過剩投資不足的現象。同時有效需要增加，則對貨物的需要量增加，亦不致發生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的現象。這是凱氏對於正統學派思想的重要修正，業已引起經濟思想界之普遍注意。而且這種看法，自從羅斯福總統就職後，就分別付諸實施，並已獲致非常效果，此即羅氏的新政（New Deal），其在經濟上的各種措施，其他各國也都起而效，以致形成了新型的經濟政策，效舉其比較重要者分別陳述如次：

(1)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之合流，是當前經濟思想之重要特徵。貨幣政策同樣以達到人民之充分就業為其宗旨。故一般貨幣政策之措施，均視經濟現象而轉移，通常推行之措施大要如次：即第一升降再貼現率。在美國各區聯邦準備銀行有權視各地區經濟情形升降對各會員銀行之再貼現率，如果市面銀根鬆濫，聯邦準備銀行可提高再貼現率，以收縮市面之信用。反之市面銀根堅俏，則可降低再貼現率以擴張之。如此一升一降，俾使經濟保持正常發展與繁榮。第二次公開市場政策（Open Market Policy）（註十一）。即政府得視經濟活動情形，在市面公開買賣公債票。換言之，當市面銀根鬆濫，有發生通貨膨脹跡象時，政府可以出售公債票，以吸收市面之游資。反之，如市面銀根堅俏，有通貨緊縮之跡象時，則可買入公債票，以增加市面流通之貨幣量而減緩通貨緊縮之壓力，如此一賣一買，使經濟保持正常發展與繁榮。第三伸縮準備金政策。依照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法規定，各會員銀行須將存款準備金存放於各區聯邦準備銀行，而各會員銀行之信用擴張，須視準備金之多少而定。故各區聯邦準

(176)

備銀行對各該區會員銀行有權控制其信用擴張情形。易言之，如當市面銀根鬆濫時，聯邦準備銀行可以提高各會員銀行之存款準備金，如此即可迫使各會員銀行收縮其信用，以減少市面通貨之流通量。反之，在市面銀根堅俏時，可減少各會員銀行之存款準備金，以擴張各會員銀行之信用，而增加市面通貨之流通量，如此一伸一縮，以保持經濟之繁榮與充分就業。

(2) 財政政策：財政政策亦隨着經濟思想的轉變而改變了以前的面目，可得而言者如次：第一預算政策。近年來預算政策有根本上的變化。以前的預算政策在求預算的平衡，其他在所不計。但現在的目的在維持較高的就業水準，至於預算平衡與否，倒為次要的考慮，有的學者主張預算不應採取年度方式，應以整個經濟循環為主，不過此點尚在討論階段，尚未成定論。至於預算平衡已經失去了其傳統的重要性，各學者間似乎都一致的看法。預算多少應視經濟情形而定，平衡與否，不必計較。如當經濟有衰退跡象時，此時之預算政策應減少收入，以增加人民之所得。同時增加支出以彌補人民消費之不足。如此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其結果必然是赤字預算。但其目的在達到經濟之穩定，如果能達到經濟之穩定，即如預算不平衡又有何妨？反之，如當經濟過於擴張之際，政府可以增加收入以減少各人所得，同時並壓縮政府支出，以免經濟過於擴張，如此收入增加，支出減少，預算不但達到平衡，而且有巨額賸餘。第二租稅政策。如前所述，租稅政策亦因配合經濟之活動而不同，如當經濟衰退時期，政府可以減低租稅，以增加各人所得，增加公司所得，使其不得擴大再生產。同時在各人所得方面又可採取累進稅率，對於所得低者完全減免，以增加其消費；對所得大者，提高其租稅，以減少其儲蓄，如此不但有助於經濟衰退之防止，而且兼可達到財富重分配之目的。反之，當經濟過於擴張之際，則可採取與前相反之措施，加以糾正。如此靈活運用，以求達到經濟之穩定，而確保高度之就業水準。第三公共工程政策（Public Works）（註十二）。此政策為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之措施，由於前面之分析，經濟之蕭條乃源於投資之不足，而投資之不足，又由於有效需要之不足。私人既然因為無利可圖而不願參加投資，政府當然即可出而填此漏洞，如此投資增加了，人民所得亦隨着增加，人民所得增加，即對貨物之有效需要增加，因而即可增加人民對於貨物之消費量。消費增加則可使經濟衰退現象為之減輕。且公共工程又為大家共同之福利，自身既非生產財和消費財的生產，故在實際上亦未增加貨物的供給量，但却能提高人民就業水準和增加人民所得，此為實施公共工程政策之目的。美國羅斯福總統為應付當時的經濟恐慌，曾提出國家工業復興法案及公共工程計劃。旋又設立聯邦工程管理局，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此方面支出計達一七八億元之多，就業人數在三百萬人以上，有名的 TVA 即是這方面的輝煌成就。故公共工程政策對於經濟之穩定作用，現在已經是成為不爭之事實了。

(二) 反獨佔政策之實施：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在十九世紀末葉，的確有如馬氏所說的集中趨勢，但人類必竟是有智慧的動物，決不會聽其自然的發展，以流毒社會及貽害世人。所以在一八九〇年美國即有舍曼反托拉斯法案（Therman Anti trust Act），其目的在禁止大公司以差別價格及拘束契約方式以遂行其獨佔之目的。不過實施結果並不理想，迄至一九三〇年代，羅斯福

執政時期又連續通過交通業法案，公開事業握股公司法案及國家工業復興法案。其中尤以後者為最重要，除詳細規定消除大公司為壓迫同業退出生產所當使用的傾銷低價等不合理的競爭方法以外，對於大公司彼此間協議限制生產以及劃定彼此的銷售範圍等方面均在限制之列。由於以上諸法的相繼實施，得使工業獨佔的情勢為之扭轉，再配合其他的措施，而使資本主義另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於世人。

(三)私有財產性質的轉變：近代股份有限公司的發生是一件劃時代的創舉。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需要亦隨之而加大。而巨額的資本又非少數私人所能勝任，因而想出此種集腋成裘的方法，使資本主義得以順利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能夠達成時代的任務，正因為其本身具有很多優點，其中最重要者乃為每股金額少，個人得因自己財力任意購買，而且所負之責任僅以股票之面值為限。如此經營順利，固然可以分享紅利；經營失敗，其損失亦不過為所有之股票而已。以前因經營失敗而致傾家蕩產之危險即可為之消除，同時股票又可以自由流通換取現金，以應緩急之用，所以股票在手，不但等於現金，而且又可以謀利，誠為生財之最佳途徑。由於每股金額小，縱係中下層階級，亦能購買，因而使財產所有權普遍分散於社會，不致為少數資本家所獨佔。同時復由於現代生產技術的進步，不但所需的巨大資本不是少數人所能單獨經營，而且管理技術日趨複雜，亦非普通人所能勝任。所以今日資本家自己兼任經理的情形已屬罕見，現在公司的經營全部由聘請的經理與高級職員擔任，使企業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為之分開；公司的經理等辦事人員既係聘任性質，一切均係依照國家法律及公司章程規定辦理，當然不需要壓迫工人以圖利。因為公司既非自己所有，自己又何必代人受過呢？嚴格言之，經理與工人都是公司所聘僱，其性質原無大區別，故經理亦無必要來敵視工人。而且公司內上自經理，下至工人，差不多都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因而大家都是本公司的股東，擔任經理者更不願作此不討好的事，此為近代工人待遇所以日趨好轉的最大原因。再者，資本的巨大，股票數額之衆多，亦非少數人所能壟斷。同時股票是財產所有權的代表，也可以說是實質財產的抽象化。本來所有權的定義應該包括佔有、使用、收益以及處分等權利，現在股票的發生使所有權的佔有性及使用性脫離了所有權的範圍，因而亦沖淡了人們對於財產所有權的觀念。這種所有觀念的轉變，減輕了資本主義所發生的流弊，變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所以我們對於這一點應該予以密切注意。

(四)勞工組織力量的強大：以前勞工生活的悲慘，一半因為政府採取自由放任政策，沒有予以充分的注意與保障，一半亦因勞工本身散漫沒有組織，不能與有力的資本家分庭抗禮，而致處處吃虧，過着悲慘的生活。但是這種情形自十九世紀中葉，已經開始有了轉機，勞工的組織逐漸強大起來，因而亦轉移了勞工的命運。美國勞工界有兩個強大的組織：一即美國工人聯合會（America Federation of Labor）簡稱A.F.L.；另一個為產業組織大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簡稱C.I.O.；美國勞工運動在兩大全國性組織之下，容納了絕大部份有組織的勞工團體。A.F.L.代表全美職業工會，C.I.O.代表全美產業工會，一九五〇年兩大組織的會員人數達一千五百萬人以上，成為美國人民團體之最大者。現在美國未加

(178)

入勞工組織的工人很少，具有如此龐大組織的勞工，其與資本家談判的力量就可想見了。談判不能達到協議時，即以罷工怠工相威脅，資本家爲了避免更大的損失，幾乎達到有求必應的程度。所以現在美國勞工的工資，不但有保證工資的規定，而且有與年俱增的工資規定。這種情形恰與馬克斯的想法相反。因之我們說無論就那一方面來觀察，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已非馬氏當時的面目了。如果還膠柱鼓瑟而仍以當時馬氏的看法來批評資本主義社會，不但是不合乎事實，而且亦表示自己的無知與愚昧。

六、結 論

共產主義是馬克斯的憤世嫉俗之作，是經不起理智的分析的，因爲學術思想是理智的結晶，而不是感情的發洩。儘管他自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但確無半點科學成份在內，因爲科學是純客觀的分析，不能帶有任何主觀成分或偏見。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爲唯物論，唯物論主張「物」爲宇宙存在的主宰。由於重視「物」才形成了馬氏以經濟解釋歷史發展的唯物史觀，由於重視「物」才形成了馬氏剩餘價值論與階級鬥爭論。但馬氏忽略了人生幸福的領域並不僅限於物質生活一面，而尤要者乃爲精神生活的滿足，正因爲他這種過分的重視「物」的看法而發生了不可彌補的錯誤與流弊。我們知道共產主義係由於馬氏對資本主義的憎惡而憤恨，因憤恨而生「時日曷喪，與汝偕仁」的妄想。基於此，所以國際共產黨則以共產主義作武器，到處歪曲事實，散佈邪說，鼓動風潮，造成動亂，以期達到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之目的。作者認爲共產主義不但泯滅人類自然的本性，違背社會進化的潮流，違背人類文化的傳統，而且在實踐上證明是澈底的失敗，加以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可說共產主義的理論已宣告破產，且成爲無的放矢之論，共產主義的崩潰已成爲定局。可惜在民主陣營裏仍有一部份人士的愚昧和迷惘，憧憬着黑魯雪夫的「和平共存」的謊言實現，或鼓吹中立主義，以期求得一時的苟安，這種心理的作祟，真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危機，但他們却忘記了黑魔曾經說過「要埋葬資本主義」的狂語，所謂和平共存者，不過是戰鬪的準備和前奏，如果真的相信，則必然上了大當，共產主義之爲害人類，乃有目共睹，當人類的命運面臨生死存亡絕續的關頭，我們要作勇敢而智慧的決定，除駁斥共產主義的理論與揭發野心家的陰謀外，民主陣營必須加強團結，以正義的力量粉碎共黨赤化世界的迷夢，則共產主義的覆亡指日可待也。

附 註

註 一：浦薛鳳著：現代西洋政治思潮。

註 二：國父著：軍人精神教育。

註 三：見The Wealth of Nations by Adam Smith。

註 四：總統 蔣公著「爲何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 註五：海思、穆恩、威蘭合著：「世界通史」。
- 註六：陳廷璠譯：「世界文化史」。
- 註七：同前書。
- 註八：見馬克斯一八六五年六月在國際勞工協會「工資、價格與利潤」演講詞。
- 註九：劉道元著：「新資本主義論」
- 註一〇：見The General Theory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by J. N. Keynes。
- 註一一：見Economics of Nations by Adam Smith。
- 註一二：同前書。